瀋陽文史資料

第六辑

日本学术文献
新闻研究室

瀋陽文史資料

沈阳文史资料

第六辑

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1984·6

目　录

回忆阎宝航同志…… 卢广绩（ 1 ）
敌营十年…… 孟庆赫（ 19 ）
沈阳中街史话……赵睿孚 侯维翰（ 45 ）
闻名东北的萃华金店…… 赵瑞馥（ 66 ）
沈阳劝业商场…… 赵树芝（ 74 ）
旧沈阳的机械工业…… 文蔚之（ 78 ）
漫话沈阳解放前的自来水工业…… 沈绳武（ 85 ）
沈阳私营金融行庄概貌…… 王　恣（ 89 ）
张作霖统治时代的沈阳金融…… 田锡侯（110）
伪满大兴公司的重利盘剥…… 罗敬之（118）
伪满兴农合作社简介……秉　信 高　仑（126）
张作霖家族…… 张闾庸（134）
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纪要…… 罗巨峰（141）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沈阳县的乡村教育
…… 崔良璧（154）
一代名伶筱桂花…… 王立夫（162）
清入关前都城及首府述略…… 李凤民（177）
沈阳故宫今昔……仲　明 张连第（196）

阎宝航同志遗像

回忆阎宝航同志

卢广绩

阎宝航同志是我的同乡、同学、同事。我们相识五十余年，特别是在一九三一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为抗日救国、复土还乡，曾长期在一起并肩战斗。可以说是生死与共，患难相知。

宝航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呕心沥血、奋斗一生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想不到晚年竟惨遭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，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含冤逝世。

今天，宝航同志虽然已离开我们十四个春秋了，但他的音容笑貌、革命精神，却使我们永远不能忘怀。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，他机智勇敢、博大襟怀、顽强斗争的崇高品格，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的。

（一）

阎宝航字玉衡，一八九五年生于辽宁省海城县。幼年在家乡读书。辛亥革命后，我们先后考入奉天两级师范学校。我在师范本科第十班，宝航在十一班。当时在本校就读的海城学生达百余人，组织有同乡会。我同宝航都参加了这个组织，因此有较多的接触机会。学生时代的宝航，学习刻苦，成绩优异。又因他待人

诚挚笃厚、肯于助人为乐而得到同学们的称赞。

那时，沈阳郊区尚无公立小学校。一些乡村私塾还是以讲授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以及四书五经等为主要课程的旧式教育。为了帮助私塾进行教育改革，宝航同我和关思久等同学，利用假日，到沈阳市郊帮助塾师讲授一些新知识，并以各种介绍新科学、新文化的书籍相赠，特别是提倡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。我们的行动，曾受到当时教育界人士的赞许。

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日本帝国主义乘欧洲各国忙于战争、无暇东顾之机，派兵占领了原德国侵占的中国领土青岛和胶州湾，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实际上是灭亡中国的“二十一条”。当时袁为了龙袍加身而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，竟不顾全中国人民的反对，接受了丧权辱国的“二十一条”。袁的卖国行径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抗。当时我们两级师范学校的学生，虽然在当局的严密监视下，不能参加社会上的反袁斗争。但在校内，我们写墙报，组织集会，控诉袁世凯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。宝航同志积极参加了这些斗争。他写文章、发议论，号召同学们行动起来和反动政府做坚决的斗争，很快便成了学校中反袁斗争的核心人物。

那时，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经常组织“德育讲演”、“科学讲演”、“辩论讲演”以及各种球类比赛，颇受一些青年学生的欢迎。我和宝航等同学在节假和星期日也经常去听讲。特别是宝航同志，认为这类活动对青年人开阔视野、丰富知识很有帮助，所以，特别热情积极地参加。因此，他于一九一九年于奉师毕业后，毅然到青年会做干事。因我教书的两级师范附属小学距青年会很近，所以仍经常到青年会参加一些活动，彼此接触机会更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多，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当时，青年会的总干事是美国人普赖德；干事有丹麦人华昌山和培德深等。普赖德为人正直，思想进步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曾因反战坐过牢。我在一九三五年访美时，曾专程拜访过他。那时他在美国费城从事教育工作。在他创办的国际学院里，有各国学生。当时美国种族歧视很厉害，但是他主张黑孩子同白孩子都是美国人，不应歧视黑孩子。所以，在他创办的学校里，不同民族或种族的学生能和睦相处。

宝航到青年会不久，就和普赖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并在普赖德的支持下，积极开展各种活动，对青年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爱国主义教育。因而，很快的就以青年会为核心，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。

不久，青年会干部郭纲去广州开会，回来时，带回一些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。宝航就和吴竹邨、苏子元、郭纲等一起学习、讨论。这是辽宁青年接触马列主义的开始，为以后辽宁地区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基础。后来党派任国祯、韩乐然等人来沈阳时，都是以青年会为据点开展工作的。宝航同志曾向我讲过，当时青年会还不断收到从上海寄来的《响导》、《新青年》等刊物。这对宝航同志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，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。

那时，由于军阀混战，社会动荡，人民群众生活很苦，特别是贫民子弟，无力读书，流浪街头。宝航同志看到这一切，极为痛心。因此，他提出创办贫儿学校，以解决贫苦人家子女的就学问题。

他的主张深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。特别是郭松龄将军的夫人韩淑秀女士，对此非常热情，积极赞助。她自愿捐款，自愿做义务教员，为贫儿学校的建立，做出很大贡献。在旧中国，做为

将军的夫人，这样热心于贫儿教育，实在令人敬佩。办学伊始，困难重重。教室、经费、人员都颇感不足。但师生团结、心情振奋。贫儿学校的校歌有这样的词句：

室不蔽风寒，阴森破庙二三间，筚路褴缕就开篇，设备自难全，跪写捧书念，冬日阳光下取暖，师生意志坚，弦诵不辍乐陶然。

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，宝航同志亲自教课，做义务教员。并和同事们共同努力，克服了重重困难，贫儿学校办的很好，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。张学良、郭松龄、朱庆澜、宁武等都给予积极的支持，使贫儿学校越办越好，声望越来越高。最多时，学生达千余人，为国家培养了不少有用的人才。贫儿学校的校长关思九先生，是我在两级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班同学，今仍健在，居住天津。据他介绍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贫儿学校曾将一部分进步的学生送到延安参加革命。现在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李涛、前辽宁省民政厅长李青等同志，都是当年贫儿学校的学生。

一九二二年五月前后，我从海城回到沈阳。当时我没有工作，住在青年会内宝航同志的办公室达两个多月。生活上得到宝航的很大照顾。

这期间，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，奉军失利。应张学良将军之邀，由奉天青年会总干事普赖德、盛京施医院雍院长(英国人)、北宁铁路局工程师李奇尔（英国人）三人出面调停的结果，奉、直双方以山海关为界，实行停火。战争给山海关一带人民群众造成很大灾难。普赖德和雍院长希望张学良将军能给予救济，张表示同意，并要青年会等有关单位派员前往。承普赖德和宝航的推荐，我被委派为青年会代表，赴山海关地区放赈两个月。回来

后，在宝航、王卓然、普赖德的帮助下，张学良将军先后安排我到锦县、营口工作。

一九二五年“五·卅”惨案发生后，宝航等同志积极活动，组织沈阳学生两万多人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，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。这对唤起群众，特别是青年学生的觉醒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后来，我和宝航到北京面见张学良，宝航向张提出要出国留学，得到张的同意和支持。

（二）

一九二八年，宝航同志学成归国时，普赖德已辞去青年会总干事一职回国，由宝航同志继任。在这时，我已被委派到奉天总商会任副会长。

一九二九年秋，“太平洋国际学会”在日本西京召开大会，中国派出以余日章为首的代表团参加大会。行前，中国代表团在沈阳举行筹备会，宝航同志为筹备会主任。恰在这时，宝航从张学良处获悉“田中奏折”的内容。征得张的同意，决定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一阴谋侵略中国的罪证，译成英文，公布于世。

宝航同志还在“太平洋国际学会”上，揭发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阴谋。并把“田中奏折”的英译本，分发给与会各国代表，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大白于天下。参加会议的日本首席代表松冈洋右恼羞成怒，竟以退出会议相威胁。

一九二九年以后，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侵略阴谋变本加厉，使三千万东北父老处于日本侵略者的严重威胁之中。目睹这一切，宝航表示无比的愤慨和忧虑。为唤起人民群众的觉醒，他发起组织了“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”，会址设在奉天基督教青

年会内，并创办了《常识半月刊》，大力宣传爱国主义思想，号召人民群众和日本侵略者做坚决的斗争。同时，还进行了提倡国货、抵制日货等宣传教育活动，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。

当时，日本浪人还向东北大量输入鸦片、海洛英等毒品，毒害中国人民，妄图以此实现其亡我国家、灭我民族的罪恶目的。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活动，宝航同志极为愤怒，挺身而出，组织了“辽宁省拒毒联合会”，并自任会长。通过各种不同形式，积极向人民群众宣传吸毒对国家民族的巨大危害。宝航同志还走上街头，大声疾呼，号召人民群众要拒吸毒品，爱国图强。拒毒会还得到辽宁省邮政局意大利籍邮务长巴立地的配合，查剿了日本人贩运的海洛英三百八十六包、鸦片四百箱，在小河沿当众烧毁。并邀请各国驻沈领事前往现场观看，唯有日本领事不到场。人们看到成百箱的毒品顿时化为灰烬，真是大快人心！当时，这一壮举，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。

那时，北宁路有一条支线通往东北大学工厂。附近有日本人经营的榊原农场。一九二九年六月，日本驻沈总领事林久治郎事先没有和奉天当局协商，竟以这条铁路影响农场管理为借口，指挥日本军警强行拆除。后来当局派交涉署长王镜寰向日本驻沈总领事交涉，日方竟蛮横无理，并以武力相威胁，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。宝航同志当时指出：虽然当局一再忍让，日方却愈加蛮横嚣张，这实在是欺人太甚。我们只有组织起来，用我们的实际行动，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捍卫国家主权。于是，他邀车向忱、我和王化一等各方人士一起研究，决定成立“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”（简称“外交协会”），借以监督和支持政府的对外交涉事宜。宝航同志被选为“外交协

会”的主席团成员。“外交协会”宣言犹如讨敌檄文，尖锐指出：“近百年来，帝国主义者列强挟其残暴之威焰，来临吾华，铁蹄到处，山河变色，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强迫订立，一切特权之掠取，使我国沦于次殖民地之悲惨地位而莫能自拔。在帝国主义集团之中，对我国压迫蹂躏尤为特甚者，则为东邻日本……。民国十八年（一九二九年），六月二十七日，日本警宪无理拆毁我北宁铁路支线之事件，实为刺激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之主因，迨日本七月间中东路事件之发生，各县分会也相继宣告成立，以一致之目标，做共同之奋斗”。发表宣言的同时，还出版了《国民外交半月刊》。由于宝航等同志的积极努力，使外交协会的工作，卓有成效。到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，已扩大到东北三省，并改名为“东北国民外交协会”，分会达四十六处之多。

一九三一年四月，日本帝国主义蓄意挑起了“万宝山”事件，并乘机扩大宣传，歪曲事实，在日本和朝鲜的报纸上，捏造“在中国的韩侨被杀无数”的谎言，并在朝鲜境内掀起大规模“排华暴动”，致使在朝鲜的中国侨胞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。当时，在外交协会内部，有的同事激于义愤，主张对朝采取报复手段，借以显示一下我们的力量。宝航同志严肃指出，如果我们进行报复，无疑受害者则绝大多数是朝鲜无辜的人民群众。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又很可能以保护韩侨为借口，出兵进占东北。所以我们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可乘之机。经宝航大理明言说服下，得以使事件没有进一步扩大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没能得逞。事后，外交协会派我和王化一、王小隐三人携带四万元到朝鲜对受害侨胞进行了慰问。

（三）

一九三一年“九·一八”日军占领沈阳的第二天，日本军警到商会（国民外交协会设在商会内）等处，搜捕外交协会的负责人。这使我们认识到，继续留在沈阳，被捕的危险很大。于是，我们决定去北京从事抗日救国的工作。

九月二十三日，由宝航事先联系好的迫击炮厂工程师美国人麦尔斯驾驶汽车，送宝航、金哲忱和我到皇姑屯车站登车去北京。

我们到京后即刻见到张学良。他向我们解释说：“南京政府已下达了不许抵抗的命令，做为军人，我只有执行。”当时张病初愈，情绪低落；可以看出，他的内心是充满了矛盾的。宝航听后，情绪非常激动。反复执言讲：军人不能为保家卫国尽职尽责，把国家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，使三千万家乡父老陷入水深火热之中，这是对国家民族的犯罪。宝航同志还表示希望张学良不要做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。并力陈必须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国家才有希望、人民才有出路的道理。当时张学良听了，很为之动颜。

九月二十七日，宝航同志邀集我和高崇民、王化一等东北各界人士成立了“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”，会场设于西单奉天会馆。以“抵抗日人侵略、共谋恢复失地、保护国家主权”为宗旨。这个抗日救国组织，在其成立期间，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曾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。记得，当时宝航同志曾不辞劳苦地到南京、上海等地宣传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东北人民的抗日救国活动以及各地义勇军奋起抗战的情况。回京后，又在北京西山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并办训练班，为抗日救国培养人才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往见张学良将军。谈话中，宝航同志一时激动，张学良也没按住火气，双方发生矛盾。张大声嚷道："我不抵抗、不爱国，对不起家乡父老，我引咎辞职，让你们来干。"对此场面，宝航同志也觉得很难过，曾一度想离开北京。后经大家劝说，和张又言归于好。为此事，张学良后来还曾向宝航同志表示过歉意。

这使我又联想起另一件事。当时在上海有一位叫吴迈的律师。"九·一八"事变后，对张学良不抵抗，很为不满。他在北京见到张学良时，当面将写有"夫差尔忘越王杀尔父乎"的手迹，递交给张学良，以此来刺激张。张见后，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和吴握手，表示感谢。从这里，可以窥见张学良当时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的心情。

救国会成立后，虽然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，但经费仍感不足。适值这时接到上海爱国团体的来电，表示可在财政方面予以资助。我和宝航同志遂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晚抵沪，住在上海青年会。第二天夜里，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袭击驻守上海闸北的十九路军，遭到中国驻军的英勇抵抗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"一·二八"淞沪抗战。十九路军的英雄行为得到上海和全国人民的坚决支持。我们在战火中，见到了黄炎培先生。黄先生看到我们都与张学良有关系，认为我们也站在不抵抗的立场上。所以，对我们很冷淡，语多讽刺挖苦之意。我们回到住处谈起这件事，宝航讲了："我们虽然受了点委曲，但却看到黄先生的一片爱国心肠，可敬可佩。"我们又找到了朱子桥将军，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并为我们筹措一万元电汇北京。

回到北京，我们又讲起黄的态度，大家很生气。高崇民当即给在上海的杜重远写信，要他离开上海。信中有“南人归南，北人归北，分道扬镖”等语。杜接信后找到了黄炎培先生，说明其意，黄始醒悟。后来黄随宋子文到北京时，曾亲自找我与宝航同志做以解释。

“唐沽协定”签订后，华北局势突变。张学良将军被迫下野出国，救国会已不能开展工作。当时，一些人曾产生消极情绪，但宝航同志仍是信心十足。他在给我的信中写到：“事要不难，我们便不做。当前正因为国家被侵略，人民遭涂炭，我们才出来工作。为抗日救国，为恢土还乡而努力奋斗”。

不久，宝航又和高崇民等同志成立了“复东会”继续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忘我工作。

一九三四年春天，张学良将军从国外回到上海。宝航同志和我等前往看望。张见到我们，百感交集地说：“我回国时，有人到新加坡接我，有人到香港接我。从香港到上海的船上，这些旧相知仍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那样狂饮豪赌。意然没想到今天东北领土丧失、国破家亡之恨，我真感到有些失望。你们虽然哪也没去接我，却在搞抗日救国，支援义勇军。我看接我到新加坡的、到香港的一些人，不是为了官、就是为了钱。还是你们真心实意的要做些实际工作。”此后，张学良对宝航等感情益深，遇事多与之商量。

张学良将军在国外，大半时间在意大利，和墨索里尼的女婿颇有些交往，可能受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影响，回国后，便提出拥蒋抗日的主张，支持蒋介石“先安内后攘外”的反动政策。并认为在国民党军队内部，也有主张抗日的，如黄埔系军人。还

说服我们要和这些人搞好关系。不久，由张学良将军主持，成立了“四维学会”。所谓四维，来源于管仲“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”之说。张学良任理事长，理事除阎宝航、高崇民、王卓然、王化一和我之外，还有黄埔系的贺衷寒、戴笠、邓文仪、刘建群等。

开始，宝航同志因学会名称没有抗日字样，坚不参加。后经张学良劝说，才勉强入会。我记得张当时讲：会名虽没有抗日的意思，实际上还是以抗日救国为宗旨；希望大家能从大局出发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。

学会成立后，张学良会同我们到南昌见蒋介石。事后，蒋介石下令留宝航到“新生活运动总会”工作。宝航同志经过认真考虑，认为这是打入蒋介石政权核心，是为抗日救国做出新贡献的好机会，于是前往就职。在特殊的斗争场合，宝航勇敢机智地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
一九三四年九月，张学良派我出国考察。一九三五年十一月，我从国外回到上海，见到宝航、高崇民以及因“新生事件”被押在苏州狱中的杜重远等同志。

崇民同志告诉我不久前，在“四维学会”的理事会上，高崇民同志提出联共抗日的主张，宝航同志坚决支持高崇民的意见。而贺衷寒则高唱拥护领袖（指蒋介石）、“安内攘外”的陈词滥调。双方矛盾日趋激化。不久，我和宝航同志到西安看望张学良将军。当时，东北军奉蒋介石的命令，在陕北对红军作战中，连吃败仗，损失惨重，使张学良处于进退维谷的困难境地。我们向张表示，希望他能够认清形势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，停止剿共，联共抗日。张表示同意，但对于蒋介石，却仍然抱有幻

想。事后，宝航、高崇民等同志又几次到西安，劝说张学良转变态度，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，团结抗日，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做出贡献。恰在这时，一位叫高福之的东北军团长，被红军俘掳释放后到西安。高在被俘期间，受到共产党的帮助教育，对共产党、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都有一定的认识。所以，回到西安后，他也做张学良的工作，对张的触动很大。可惜高福之在西安事变后被刘多荃误杀。周总理曾指示要查出高的后人。我当时在沈阳市政协工作，根据周总理的指示，派出专人，费了很大的周折，才在长春找到高的儿子高本堂。西安事变四十五周年时，高本堂到北京参加了纪念大会。

我记得，当时党还派李克农同志会见张学良、做张的工作。使张学良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后来，张亲自乘飞机到延安，会见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，表示要说服蒋介石走联共抗日的道路。不久，张学良又在安塞见到周恩来同志，彼此做了长时间的谈话。周恩来同志向张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、并介绍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有关问题，使张进一步认清了形势，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决心走联共抗日的道路，张学良将军遂停止了与红军的战斗。但张的行动，使蒋介石大为恼怒，乃改派蒋鼎文为“西北剿匪总指挥”以便继续对红军作战。蒋的顽固态度，终使张学良说服蒋介石联共抗日的希望最后破灭，遂与杨虎城将军联合发动了闻名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。“西安事变”后，张学良将军在南京被蒋介石扣押失去自由。宝航同志为使张学良将军获得自由，曾往来于南京、西安等地，从各方面进行了积极不懈的努力。一九三七年六月，宝航同志又和刘澜波、高崇民、杜重远、车向忱、栗又文以及我本人等党内外

一些同志，在北京成立了“东北抗日救亡总会”。宝航同志被选为主席团成员。栗又文为秘书长。

（四）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“芦沟桥事变”发生后，全面抗战开始了。我于六月去南京，住在大禹村一号宝航同志家，得知周恩来同志也在南京。我就同宝航同志前往看望，恰值周恩来同志外出，我便留言相告。晚间周恩来同志来到宝航家，彼此见面，极为亲热。那时正是淞沪战争的紧张阶段，为防敌机夜袭，实行灯火管制，夜间市内交通断绝。因此，周恩来同志就住在宝航家，同宝航和我谈到下半夜三点钟。给我们讲抗战初期的形势，国共重新合作的情况等。我们还特别提到关于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的问题。那时我们还有些天真幼稚的想法，认为国共合作、全面抗战开始了，主张团结抗战的张学良将军自然应当获得自由。并认为只要周恩来同志向蒋介石提出这个问题，会得到顺利解决。周恩来同志当即表示：“我和你们同样关心汉卿，但事情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简单。蒋介石不是为了抓我，悬赏二十万元的高价吗。”

这次亲自听到周恩来同志的谈话，使我们耳目一新，对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特别是宝航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，听到周恩来同志的谈话，颇受感动，并对周恩来同志产生了极其敬仰之情。从此以后，特别是在重庆，宝航见到周恩来同志的机会更多，并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，出色地完成了各项重要任务。

“七·七”事变后，中苏恢复邦交，南京政府拟派宝航为中国

驻苏联伯力总领事。而当时苏方尚认为宝航同志为黄埔系，表示不欢迎。而我和高崇民等同志也希望他留在国内，为抗日救国做贡献。宝航遂坚辞没就职。

不久，“八·一三”上海抗战爆发。为支援前线，当时我们经常来往于南京、上海之间，搞宣传、组织和运输事宜。那时的条件很艰苦，时有敌机轰炸，时遇暴雨袭击，但宝航同志始终满腔热情，不避艰险，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忘我工作。

上海、南京陷落后，我们退到武汉。宝航和我都住在武昌明月桥“新生活”俱乐部。这时，“东北救亡总会”的一些领导人如高崇民、杜重远、徐寿轩、王化一等，先后来到武汉，在这里继续开展工作。

当时，周恩来、邓颖超同志也在武汉，和宝航等时有接触，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。“东北救亡总会”还先后邀请邓颖超、潘梓年等同志做过报告。这使我们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很受鼓舞。

那时，东北中学迁到了湖北鸡公山。张学良将军被囚后，该校仍由原校董会维持。不久，东北籍的国民党员、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周天放之流，为了抢夺这所学校的领导权，事先不和校董会协商，竟以湖北省教育厅的名义，直接向东北中学委派校长，遭到全体师生的坚决反对。国民党当局竟以扣押学校教师相威胁，激起师生们的更大愤怒，遂举行了请愿和示威游行。当时，宝航和杜重远等同志，同东北中学师生一起，和周天放、赵雨时之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迫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和湖北地方当局出面调停，给周天放一伙以严重教训。

一九三七年九月，平型关大战的胜利，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